

分析探讨

新华侨华人与民间关系发展^{*}

——以中国—新加坡民间关系为例

吴前进

(上海社会科学院 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上海 200020)

[关键词] 新加坡; 新华侨华人; 跨国华人; 民间关系; 国家关系

[摘要] 以新加坡的中国大陆新移民为视点, 在民间关系研究的框架内, 探讨和阐述了新华侨华人和跨国华人的概念特征、新华侨华人与中—新民间关系的发展、海外民间关系发展的时代价值以及民间关系的模式特征和意义。研究显示, 国家关系的建立, 为民间关系打开了交流和交往的正式而广泛的渠道; 民间关系的良性互动, 为国家关系的改善、发展和地区关系的整合, 奠定了厚实的民间基础; 跨国移民之于民间关系、国家关系和地区关系的多元探寻, 为全球化时代的移民个人和国家关系的发展, 提供了双赢互利的方向。

[中图分类号] D634.33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07)02-0007-16

New Ethnic Chines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to-People Relationship: A Case Study of the People-to-Peopl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ingapore

WU Qian-jin

(Institute of Asia Pacific Studie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20, China)

Key words: Singapore; new ethnic Chinese; transnational Chinese; people-to-people relationship; national relations

Abstract: Based on the case of new immigrants from Chinese mainland to Singapore and the framework of people-to-people relationship studies, the paper discusses and expatiates the concep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thnic Chinese and transnational Chinese, their impa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to-peopl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Singapo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people-to-people relationship, and the pattern and feature of people-to-people relationship. It shows that the foundation of state-to-state relationship can open up the

[收稿日期] 2007-02-09

[作者简介] 吴前进, 女, 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 近年来主要从事当代海外华人与国家关系的研究, 主要成果有专著《国家关系中的华侨华人和华族》及相关论文 50 多篇。

* 本项研究受“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作者感谢日本立命馆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纪宝坤教授的邀请, 参加该中心主办的“中国国际移民及其政策”学术研讨会(2007年1月25-26日), 并提交此篇论文。作者亦感谢匿名评审者给予的肯定和修正意见。另外, 本文选取了《1990年以来的中国—新加坡民间关系——以中国大陆新移民与新加坡华人社会互动为例》一文(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 2006年第10期, 第83-91页)的有关内容。

intercommunicating channel for people-to-people relationship comprehensively, and the interaction of people-to-people relationship can improve and develop national relationship and regional relationship. For people-to-people relationship, national relations and regional relations transnational immigrants have provided a win-win prospect to both the migrant himself and the national relationship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一、引言

冷战后，华侨华人与国家关系的互动影响在减弱，相反，与各居住国民间关系的联动作用在显示和加强。这种特征既是全球化进程的逻辑必然，又是新时期中国“外交—侨务”政策调整的时代反映。其典型表征是中国政府对于海外新华侨华人作为民间友好大使的角色期待以及“睦邻周边、亲近亚太”的和谐外交理念与“以人为本”侨务政策的两相配合。因此，从国家关系视角审视中国政府对于海外新移民和华侨华人的政策，无疑地，新移民和各居住国民间关系的发展及其走向会成为今后中国政府“外交—侨务”政策的一个主要选项。故而，从中国—东南亚关系视角，考察当地新华侨华人与居住国人民的关系互动，可以预测 21 世纪内，随着跨国人员往来的加速和增多，国家关系在形成和促成民间关系良性发展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地被民间关系所影响和推动。为此，本文以新加坡的中国大陆新移民为视点，探讨以新华侨华人为载体的民间互动如何在积极融入居住国的同时，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关系（移民输出国和居住国）发展做出跨国阐释和民间释义。

有关的文献回顾着眼于两方面：（一）民间关系和国家关系的互动；（二）跨国移民之于民间关系和国家关系的意义。

首先，就民间关系和国家关系的互动而言，海内外成果十分鲜见。由于本文以中、新关系为例，故评述以新加坡中国大陆新移民为着眼点，并把它视作中、新民间关系发生、发展的载体与主轴来展开。这方面，日本学者小木裕文《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¹¹一文较早地反映了日本学者对于中、新国家关系走向的敏感。他指出，中、新国家关系的发展，没有拉近人民之间的距离。相反，民间交往中存在着“近亲厌恶症”，令新加坡华人和中国新移民产生隔阂。此外，随着中国新移民对当地影响加深，新加坡担忧“再中国化”现象出现，而这正是身处“马来人海洋”的新加坡力图避免的。显然，他提出了一个由民间关系折射国家关系内容的话题——透过中国新移民和当地华人社会的互动，了解和把握中、新国家关系的现实症结和未来趋向。本文认同此方法，并以此为视角，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其次，就跨国移民之于民间关系和国家关系的意义而言，这类研究比较多地着重于跨国移民之于国家关系的推动，如墨西哥移民对于国家政策和国家关系的影响，但相对而言，有关跨国移民之于民间关系的研究，仍较为贫乏。这是因为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在西方移民研究中

20 世纪 50 - 90 年代，中国的“外交—侨务”政策（主要就东南亚国家而言）是，外交为先，侨务次之。即国家关系和国家利益是主导，华侨华人利益依附于国家利益而存在（详见吴前进：《国家关系中的华侨华人和华族》，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年 7 月）。但是，冷战后，由于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对立的逐渐淡化，经济因素和文化力量显著增强，这样，中国的“外交—侨务”政策就注入了更多的民间内容和民间因素。

2005 年，中国政府提出“和谐世界”的理念，此举意味着中国从“和平外交”过渡到“和谐外交”的根本性转变，即从国家关系的重点进展到国家关系和民间关系并重的时代，事实上，它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复活和内部治理的简单外推，而是面临不同文明冲突的现代危机，寻求人类和谐的普遍模式和共同关涉。

在这里，“以人为本”的对外侨务政策，不仅指中国政府注重和关心海外侨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也包括中国政府通过“和谐外交”理念，推展国家之间，特别是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与共处。

属于较新理论（主要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还有一个继续深化、不断探索的问题。尽管如此，前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刘宏对于跨国主义理论在华人移民问题研究中的运用，领先而突出，^[2]特别是他提出的“跨国华人”概念，表达了跨国移民之于国家关系和民间关系的双重内容，具有启发性和借鉴意义。同时，他的另一个研究特色是，从亚洲人的视角看亚洲，运用跨国主义理论分析地区内华人移民经济、社会活动的联网特征，这种来源于民间力量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区域网络构建，在全球化、区域化加深的今天，越来越具有直观性。故此，刘宏的研究为笔者提供了一个可资参照的文本。

鉴于既有研究状况，本文结合国际关系与移民研究中的共同内容，透过跨国移民认识和判别民间关系和国家关系互动的意义，旨在说明有关移民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内容及其走向，不仅影响到移民所居住的国家，而且影响到移民所迁出的国家，因为在他们选择去留的同时，相应地，社会结构因此发生变化，如在新加坡有中国新移民群体，在中国有回归移民群体，他们分别扮演着不同角色，从而直接折射出社会转型时期与全球化一致的行为方式（跨国或跨边界）、关系特征（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和制度模式（意在推进居住国和祖籍国双边关系的族群团体、联谊组织和专业协会等）。整项研究以新加坡的中国大陆新移民为例，探讨中、新民间关系的发展历程，时段以 1990 年两国外交关系建立、新加坡政府公开承认接纳来自中国大陆新移民至今为期。研究包括四个层面：1. 中、新民间关系和国家关系的进展与互动；2. 中国新移民对于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的多重影响；3. 新加坡华人社会对于中国新移民及中国的态度；4. 跨国华人社会网络构造及其之于国家关系的影响。全文立足于双边对外政策、国内结构和区域结构的三个变量之间，考察由华人移民族群所形成的跨国社会文化网络在依循和突破民族国家架构的同时，又在反馈和增进民族国家之间共存与共荣的那样一种积极态势。

二、新华侨华人和跨国华人：概念特征

在阐释“跨国华人”的概念之前，有必要对“新华侨华人”和“中国大陆新移民”的含义分别做出解释。一般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居民通过赴海外留学、就职、定居等方式，取得永久居住资格或加入居住国国籍者，为“新华侨华人”。而“新移民”（new Chinese migrants），指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正式或非正式途径实现自我或家庭的国际性迁移，并在移居地获得稳定的工作和住所，具有长期定居意愿的群体。在来源上，它包括四个类别：一是已加入居住国国籍的海外中国血统人，称“新华人”；二是既有居住国永久居住身份，又具有中国国籍者，为“新华侨”；三是通过非正常途径移居海外者，称“非正常渠道移民”，旧称“非法移民”；四为各类留学生，指通过留学后获得永久居住权和加入居住国国籍的新华侨和新华人，他们属于潜在的新移民。

从上述判别中不难看出，“新华侨华人”属于合法移民的概念，不包括各类非法迁移者，除

“新移民”为通行说法，不属法律概念。根据中国法律：“华侨是指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对“定居”的解释是：已取得居住国居留权为定居。以此而言，凡取得居住国居留权的各类新移民，为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者，为外籍华人。

指通过非正常途径进行居住点的迁移，谋求改变地域身份的移民行为或活动，由于其不被接受国承认、许可，被称为非法。近年来，“非法移民”常常被“非正常移民”的概念所取代，指未经依法批准而进入他国或在他国工作的人员被称为非法、秘密、无证件或非正常移民。因为“非法”是有其标准含意并导致犯罪的活动，为此，1994 年国际人口和发展大会建议采用“无证件”一词；但由于它未能包括那些凭旅游证件合法进入目的地国，随后又因为找到工作而违反了入境条件的移民；此外，被“蛇头”偷运入境的移民可能持有假证件；1999 年 4 月在曼谷举办的一次关于移民问题的国际研讨会上，提出采用“非正常”一词。移民活动的非正常状态可能发生在多个环节：离境、中转、入境和返回，非正常状态可能针对移民而发生，也可能由移民自己造成。国际劳工大会第 92 届会议《在全球经济中为移民工人谋求公平待遇》议程项目六，国际劳工组织，日内瓦，2004 年第 1 版。

非随着时间推移，非法迁移者在居住国获得合法身份，成为华侨或华人；至于“新移民”概念，则涵盖了合法与非法两种类型，只要是以定居为目的跨越边境的国际人口迁移活动，就为“移民”。由此说来，“新移民”概念包括新华侨华人，而“新华侨华人”概念并不涵盖新移民。目前，移民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专业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留学生移民、家庭团聚移民和非法移民等。本文关涉对象为各类合法的中国大陆新移民，不包括非法移民和短期合同劳工。

然而，对于“新华侨华人”和“新移民”的概念区分，王赓武教授的看法，并不涉及子概念和母概念的类别，而是把它视作“暂居”和“久居”的分别。在他看来，“新的中国移民的出现和新移民这一新称谓的使用，最早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部门提出来的，其对象是近年来从中国移居到国外的公民”。但他并不肯定，此一称谓是恰当的。据他研究，“新移民”概念更应被视作“新华侨华人”才比较合适。因为新华侨华人是一群保留中国国籍，或虽已入籍居住国，却随时在选择不同去向的人，他们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移民”，决意在当地定居下来，还难以下断语。同时，他明白地指出，这一看法似乎是对于他早先劝导中国政府应尽力避免使用“华侨”概念的否定。他坦言，自己也在反思过去的研究，并确信，在今天，是到了“华侨”概念复活的时代，没有必要去刻意避讳和有意否认，或代之以不确切的“新移民”来称谓现实中早已存在的“新华侨华人”现象。王赓武教授重新严格了学术意义上的“移民”和“侨民”的不同内涵，意在为人们指出新华侨华人之于居住国、祖（籍）国之间关系的变动场景：全球化时代新华侨华人的身份建构，将更多地取决于移民个人的意愿和能力，以及这种意愿和能力的多数化表达倾向。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意志，虽然决定着移民的方向和进程，却不再构成移民去留的唯一依据，大多数国家对于移民的态度正在变得逐步开放。正因此，太多不确定的个人，时时在移居地和输出地之间犹豫、徘徊。这种现实，打破了传统以来居住国和祖籍国之于移民行为选择的主导性因素，突出了侨民和移民自身选择的意义。换言之，它揭示了“新华侨华人”与“跨国华人”共有的时代含义。

“跨国华人”（Transnational Chinese），是现居英国的华人学者刘宏提出的概念。它指的是：在跨国活动过程中将移居地同出生地联系起来、具有多重关系和背景的移民个人与群体。按照他的

新加坡法律对非法移民和非法移民雇主都规定了严厉的刑罚和体罚。

有关“合同劳工”是不是移民的问题，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劳工不是移民，他们在合同期满后，必须回国，这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但历史和现实显示，在一些国家，合同劳工成为以后的移民，他们通过各种不同方式留居当地。劳工因此成为许多海外移民类型中的一种。对此，本文认为，劳工能否成为移民，要视地区和国家而定，在新加坡或马来西亚等国，劳工要成为移民，可能性比较小；但在另外一些地区和国家，劳工要成为移民，可能性存在。由于本文以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特别是知识和技术为主的高层次移民）为视点，故合同劳工，暂不作为研究对象。尽管他们对于新加坡做出了积极贡献。截至2005年底，在新加坡的中国合同劳工近10万人，其中多数从事建筑工作。此外，“陪读妈妈”（指中国母亲陪伴17岁以下小孩到新加坡报读正规中、小学校。陪读母亲可以申请工作。迄今新加坡约有1万多名中国陪读妈妈，构成当地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但其中一部分人生活艰辛。）也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因为当孩子年满17岁时，“陪读妈妈”必须回国。故而，那些“身处本国的外来者”，并非皆为移民，还有一个“为何而来，何时归去”的问题。

2005年8月12日，笔者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拜访王赓武教授时，他谈及了有关“新移民”和“新华侨、华人”的概念使用问题，作者在此引用时，没有征求王赓武教授的意见。也因此，希望没有歪曲王赓武教授的原义。若有任何不妥之处，责任在笔者。

在西方文献中，“移民”指的是以定居为目的的永久性迁移人口。它强调居住状况，特别就国际移民而言，主要指一个国家公民通过各种不同途径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作永久居留。一般而言，移民对迁入地会产生某种归属感，会主动适应当地的语言和文化，并在一定条件下去干预和改造它。如果迁入者较强势的话，还会用自己认为较先进的文化去改造原有文化，创造出新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移民对于国家巩固有着重要作用。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4版，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54页。

观察，近二三十年来形成的跨国华人群体可归为两大类：以海外为出发点和轴心的同心圆及以大陆为出发点和轴心的同心圆，二者互为补充，构成海外华人社会的新兴力量。此一群体的特征为：具有两种以上语言能力，在两个或多个国家拥有关系网络和事业基础，且具有行动上跨界性、文化上掺杂性、经济上全球性、社会上互动性和认同上多元性等共同内容。此外，他们中大多数人选择了不同于传统的“落叶归根”或“落地生根”的生存模式，代之以一种“既在此处又在别处”的游移常态。^[3]他们属于“华人世界主义”新身份的一群，而不特别固定在某一处。按此理解，王赓武教授的“新华侨华人”释义与刘宏教授的“跨国华人”定义，就与全球化时代不断增长的移民跨国居住现象相契合。跨国主义理论因此被用以解析当今海外华人群体的主流脉动和趋向。

所谓“跨国主义 (Trans-nationalism)”，指“移民形成与维系的多重的联结原籍地与定居地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进程”。它强调当代移民建立了跨地理、文化和政治边界的社会场 (social fields)。跨国主义因此成为“将民族国家疆界之外的人民与机构连接起来的多重关系和互动”。^[4]进而言之，跨国移民不仅依赖于对一个以上民族国家的认同，而且依赖至少两个社会的参与舞台，涉及双重或多重公民身份——尽管双重公民身份不一定就意味着同时直接参与两个政治舞台（公民只能是他在其中充分行使权利和履行职责的那个国家的公民）。故此，新兴的跨国空间呈现为，包含两个甚至更多国家的政治活动空间。其结果，跨国主义成为多重归属的制度性表达：母国，为移民提供文化认同的根源；居住国，为移民提供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认同与诉求的本源。^[5]在此框架中，新兴的跨国华人成为移民跨国性的实践者和体现者。

那么，新加坡是否存在类似的新华侨华人或跨国华人呢？答案是肯定的。1990年后，新加坡开始吸纳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包括直接移民和间接移民。直接移民指亲属移民、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等。间接移民指以旅游、留学、短期工作等名义出境，而后谋求在当地长期居留者。由于进入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成分多元，难以概论。故本文论述的新移民，主要指以知识和技术为主的高层次新华侨华人群体，不涉及非法移民和短期劳工。

与传统移民不同，当今跨国华人或华人精英移民，在异地追求的，与其说是生存与发展，毋宁说是雄心的进一步施展。他们游走于世界各地，随时选择不同的去向，以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正因此，凭借拥有的多种知识背景和能力，这一批人具有不断超越自我的勇气，故其社会资本的运用和拓展，在于更广泛的社会承认和更理想的社会地位。他们穿梭于居住国、祖籍国和第三国的同时，正在把个人价值、族群关怀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新时代的“跨国华人”随时在世界各地游走，身兼数职，享有声誉，乐此不疲。当他们停靠、栖息一地的時候，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一站会在哪里。当他们把知识、能力贡献、反馈给居住国和祖籍国双方时，亦在自身领域内促进和推动“这儿”（居住国）与“那儿”（祖籍国）之间的连接、交流和共享。在这种循环中，一种更适合于当代跨国华人的发展模式因之呈现：个人的“行为—关系”被嵌入到连接全球各地的知识网络中，在此框架内，社会资本得以增殖，社会网络不断拓展，个人、族群、社会、国家乃至地区之间的各种关系经过各种有意识的人为架构而实现了旨在促进相关利益共同发展的积极互动。人们发现，在新加坡，不乏这样的跨国华人。

本项研究试图把国家利益和国家关系的推进落实到民间关系架构中，回答新加坡中国新移民在定居地、原籍地以及区域关系中的真实身份、集体行为和功用辐射，以此评估中国新移民在国家关系和地区关系中的可能作为和潜在影响。同时，它对于认识国际关系领域中移民的社会功用以及国际公民社会在亚洲地区的可能端倪，具有一定意义。

三、新华侨华人与中—新民间关系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全面改善、恢复和发展。此后，通过各

种途径到东南亚留学、工作、经商和探亲的中国大陆人士日渐增多。1990年中、新建交，新加坡政府正式接纳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两国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由此日趋频密。目前，新加坡400多万人口中，主要有华族（76.8%）、马来族（13.9%）、印度族（7.9%）和其他一些较小族群（1.4%）。由于华族是构成当地社会结构的主要成分，故本项研究不涉及马来族、印度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整个研究以中国大陆新移民与当地华人社会互动为线索，探讨在国家关系建构的前提下，两国民间关系的基本内容及其之于国家关系的相互作用。此中，移民的角色和功用，作为一个自变量，呈现着民间关系的基本趋向。

（一）社会互动的初期阶段：“近亲憎恶感”

新加坡以人才立国为基本方针，它欢迎华人和非华人精英移民进入该国。1989年，政府曾提供2.5万个配额给有技术的香港专业人士和他们的家庭移居新加坡。这项政策被视为与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有关。至于公开接纳中国大陆移民是在1990年之后。其时，新加坡从接纳在欧美受过教育的研究人员开始，逐步扩大到音乐家、书法家、画家、运动员、播音员、演艺人员、留学生、技术研修人员等在内的各种专门人才，他们聚集到新加坡，奠定并促动着两国民间往来与交流的日趋开展。如今，这一新移民群体，已有30余万人，占新加坡总人口的近10%。

在新加坡目前的450万人口中，近三成人口是外来移民。新加坡对移民人口的政策非常清晰，即为了维持种族比例，马来西亚华人、中国人及印度人都是新加坡吸引的主要外来人才。见香港《亚洲周刊》2007年4月1日。

根据新加坡官方提供的估计数字，目前在新加坡求学的约5万名外国学生当中，约有1/3来自中国，人数介于1.3万人到1.5万人之间。《华语环境文化相通 新加坡吸引大量中国学子》，中新经贸合作网 <http://www.csc.mofcom-mti.gov.cn>，2007年1月19日。

[日] 小木裕文《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厦门大学《南洋资料译丛》，2003年第1期，第22-28页。必须指出的是，有关新加坡的中国大陆新移民并没有正式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所以有关的数据只能从新加坡人口数据资料和文献等间接途径中探讨和引申。据新加坡官方网站有关1990—2000年的人口数据显示，在此十年中，新加坡总人口改变了以往20年（1970—1990年）持续下降的局面，而呈增长趋势。这种人口增长的原因，主要有赖于1990年以来非居民人口的大量涌入，包括外国工人、学生和其他没有在新加坡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不包括旅客和过客）。在此期间，非居民人口的增长超过了常驻人口（包括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增长。前者年均增长率为9.3%，后者年均增长率为1.8%。在居民人口中，增长率主要是由永久居民推动的（平均年增长10%）。而新加坡公民的增长率则是适度的，年增长率约为1.3%。随着外国人进入新加坡，非居民的人口份额提高了，它从1990年的10%上升到2000年的19%。永久居民的增长率也从10年前的3.7%提高到2000年的7.2%。但比较而言，新加坡公民的人口比例则从1990年的86%下降到2000年的74%。上述官方数据，说明了1990年以来新加坡人口结构的变化状况和主要特征。由此，虽不能推测出目前新加坡中国大陆新移民的确切人口数，但30万的估计并不为过。下表是1990—2000年间新加坡总人口的居住状况，从中可以反映作为“非居民人口”构成的新移民大致的流入情况（当然，这些“非居民人口”中也包括了一定数额的马来人和印度人）以及这些移民流入对于当地人口变迁状况的影响。当然，目前的常驻人口（包括公民和永久居民）中，已有为数不少的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笔者在此感谢新加坡国家图书管理局高级参考图书馆员黄美萍女士提供的信息和指点。

新加坡总人口居住状况

居住状况	数量		百分比		平均年增长率 (%)
	1990	2000	1990	2000	
总人口	3,047,132	4,017,733	100.0	100.0	2.8
常驻人口*	2,735,868	3,263,209	89.8	81.2	1.8
公民	2,623,736	2,973,091	86.1	74.0	1.3
永久居民	112,132	290,118	3.7	7.2	10.0
非居民人口	311,264	754,524	10.2	18.8	9.3

* 常驻人口包括公民和永久居民。

资料来源：<http://www.singstat.gov.sg>

中国新移民和新加坡华人之间，有着共同血缘，表面看来，相互之间的交往应不成问题。但现实是，由于长期的疏离、隔膜以及政治体制、教育背景、社会习惯和文化价值观的不同，双方不时发生摩擦，甚至出现同一民族才会有的近亲憎恶感。^[6]一些受西方教育的年轻华人认为中国新移民贫穷、落后，专门在当地从事不正当行业，不择手段赚钱。而一些新移民本身的不良行为又加深了这种歧视和偏见。双方普通民众之间少有文化身份上的认同感和亲切感。一些中国新移民对新加坡的评价是：“新加坡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好”。认为现实与理想相差悬殊，特别是一些新加坡年轻人对中国新移民那种排斥和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态度，让人难以接受。此外，当地一些企业在用工上对中国新移民歧视的现象，也比较普遍。^[7]这样，怀着希望而来，带着失望而归。2001年，旅居新加坡多年后返回中国的女作家九丹把个人生活感悟写成小说《乌鸦》发表，引发新加坡华人和当地媒体的种种议论和评价。外界就此认为，它折射出两国民间关系所存在的微妙而复杂的情怀。^[8]

尽管民众之间负面评价超过正面印象，但还是有一些清醒的华人中肯地希望抛弃种种不健康心态，呼吁：“读了《乌鸦》，别情绪失控，更千万别因此而伤了新、中两地的友谊。”^[9]指出：“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角落都有好人与坏人，新加坡也不例外。我所认识的来自中国的朋友们，有建筑劳工，有电子厂技术人员，有大学研究生，有商界博士，也有嫁到这里的善良邻居。我们都能愉快交往，保持人类应有的友谊。”^[10]显然，睿智的新加坡华人对于移民和国家关系的理解与判断有着特别清晰的认识。他们的确看到许多身边优秀的中国新移民在努力工作。只是这种评价和认知，还没有在新加坡民众间形成共识。由于历史的原因，新加坡华人社会内部存在着受华文教育和受英文教育两大群体，他们在文化价值和身份认同等多个领域里有不同看法和矛盾。受华文教育的老一辈，力图保存华人文化的“根”源，对中国文化和传统有特殊感情；而受英文教育的年轻一代，对中华文化淡漠、排斥。^[11]然而，中国经济的发展，令新加坡政府和民间均认识到，他们必须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人，而接近、接触和了解中国新移民，无疑是一个便捷的途径。

（二）社会互动的转折阶段：文化的影响

1990年以来，中国新移民已经对新加坡社会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其中，语言运用的变迁属较为明显的特征。随着中国新移民的到来，华语、华文的运用范围在新加坡逐渐扩大。在新加坡国立大学，10多年前校园里很少能听到华语的声音，但如今华语的使用在学术精英层面率先得以复活。该校东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中90%为中国籍人士，中文系教师有80%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这在以英语为主的新加坡社会里，成为一个突出的新现象。当然，教学用语和行政用语仍为英语。在华文媒体方面，受众层面逐渐增加。由于英语教育的渗透，以往华文报纸订阅数一直比较少，但近年随着中国新移民流入和中国留学生的增加，华文报纸销售量显著增加，

“在新加坡，相比于其他种族而言，对中国人歧视的往往是新加坡华人，而非马来人或者印度人”。李剑峰：《歧视，其实就是帮新加坡推拒人才》，[新加坡]《联合早报》2003年1月8日。

《乌鸦》描写一群怀着绿卡之梦的中国女人留学新加坡的故事，作者九丹塑造了一批大陆女性为了在异国生存并长期居留，不择手段，相互倾轧，甚至出卖肉体，但最终除了身心俱疲、伤痕累累之外，仍然是一群漂泊的女人。小说出版后，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中引起了激烈反响。

2005年8月18日，笔者在新加坡遇到一位华人文物收藏家，但他不是为个人买卖，而是为了对于故国的情思而广泛收集并慷慨捐献。早年，他受原中国侨联主席庄炎林（新加坡归侨）之托，负责在海外收藏华人文物。以后他把所收集到的珍贵文物一部分捐给厦门博物院，另一部分捐给北京博物馆。他是新加坡受华文教育的一代，至今对故国念念情思，说及他们在小学歌唱长城的歌谣，说起他自己写的怀念故国的诗词时，依然声带哽咽，泪眼满眶。他让人感受到一位受华文教育者对于中国文化满怀的深厚感情。他的名字叫陈来华，开办了新加坡石叻坡市井文化民俗馆。只是这一辈受华文教育的华人人渐少，他们在担忧自己可能是新加坡最后一代对中华文化充满感情的人。

至 2002 年发行量已上升到 46 万份（英文报纸为 102 万份）。此外，在电视广播方面，TCS8 频道和 UHF 的华语广播视听者也在增加，播音员、主持人均来自中国大陆，很受欢迎。^[12]在公共场合，华语华文的影响继续扩展。近 30 万中国新移民的流入和中国观光客的增加给新加坡的语言景观带来了改观，在历史博物馆、美术馆、玛玲花园等场馆，除了英语说明之外，都附加了华语说明文，在牛车水（唐人街）地区还设置了同时写有华语和英语的路标。2001 年新加坡建国以来第一本华文版的“新加坡街道指南”出版，所有道路、建筑物、公园、住宅区、学校、岛屿、河流、湖泊等都附有华语名称，这对来自中国大陆和受过华语教育的老一辈华人非常方便，广受好评。此外，华文书籍的出版和消费也开始增加，新移民开设了出版社，经营华文书店。^[13]华语华文的社会影响在新加坡日渐扩展。政府传达的信息是：学习华文不但能更有效协助保存传统价值观，更是联系本区域的重要工具。新加坡有今天的成就，除了依靠本国人的努力外，不能忽视和邻国建立的联系。^[14]故此，提升华语华文水平，成为国家发展和地区经济繁荣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人士相信，华语华文的普及，有助于新加坡年轻一代华人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欣赏，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从而实现文化交融与社会和谐。

（三）社会互动的积极阶段：接纳和欣赏

中、新建交以来，中国新移民已经在新加坡的科学、技术、商业、宣传媒体、音乐、演剧、美术、书法、体育等领域发挥着独特的影响和作用。仅以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来说，两校都有许多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南大的教学和研究人员中，中国新移民占了颇大的比例，尤其是一些工程和科研领域，中国新移民的比例更大。对此，新加坡前任华裔馆馆长纪宝坤教授在评价新移民的作用时指出，中国新移民可壮大本地大学的科研阵容，对知识经济做出贡献。他们也能对本地文化和华社组织产生影响，使华族方言群多元化，并使华文和华语的应用范围扩大。^[15]此外，近年来活跃在亚洲地区运动会上的新加坡运动员有许多是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在学校的华语辩论大会和华语朗诵大会上获得优胜的孩子们也是新移民的孩子。^[16]当然，伴随着新移民进入新加坡的，还有中国的南北风味菜肴，丰富着当地的饮食文化。面对中国新移民多方面的作为和影响，当地媒体纷纷开设专版，报道新移民在新加坡的生活、工作、学习和创业情况，让更多的新加坡华人了解周围的新移民，也让新移民之间有相互了解和彼此诉求的平台，如，《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明日报》都辟有专刊。而对于那些歧视中国新移民的心态和行为，则不为新加坡有识之士所认同。他们坦言，歧视中国新移民的人大致有两类：一是无知者，他们持小国寡民心态，对历史和现实知之甚少；另一类是对中国、中国人与中华文化有很深的成见与偏见者。尽管如此，这两类人也在改变，越来越多的新加坡华人开始认识到中国对新加坡的重要意义。^[17]由此，又形成了第三类比较实用的华人，他们认为，为了和中国做生意，需要学习那些可以利用到的中华文化知识，以便透过贸易网络进军中国市场或在中国设立公司，但不需要因此而爱中国或中国人。的确，经贸活动会在利益驱动下展开，但随之而来的一种有关中国和中国人

新加坡中文报纸有《联合早报》、《新明日报》、《联合晚报》三份，均在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司的经营管理之下。《联合早报》由原来《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按照政府指导）合并而成。1990 年新加坡与中国建交后，《联合早报》为了减少华语书面语与中国汉语书面语之间的背离，从中国招聘了几名编辑从事校正和审核，现已有包括记者和驻外人员在内的 30 多名中国籍人士在职（[日] 小木裕文：《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厦门大学《南洋资料译丛》，2003 年第 1 期，第 22 - 28 页）。目前，华文报已成为新加坡华族各阶层人士获得资讯和知识的重要媒介，尤其是它发挥了沟通新加坡与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的网络作用，这是其他语言媒介不可替代的特殊功能。新加坡语文环境的改善，华语华文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和重要地位，为新加坡华文报业的继续繁荣开辟了前景（吴庆棠：《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 2 月，第 1 版，第 271 页）。

2003 年 10 月 29 日，《联合早报》推出《新天地》专刊报道中国新移民。旅居当地的新移民认为，此举既有助于新移民融入当地，也有助于新加坡人了解中国新移民，是一大进步。见北京《华声报》2003 年 10 月 31 日。

的认知也会在经贸互动中逐渐成形。民间交往及其相互影响的过程、内容和结构，由此折射。

值得指出的是，面对偏见和歧视，一些新移民也在自省：与其一天到晚计较人家对我们的态度，不如把时间和精力用于自我激励上，投身到新加坡赶搭中国经济顺风车的洪流之中，配合本地公司去中国经商和投资的实践，把自己的作用和价值发挥出来。^[18] 还有一些新移民更以积极乐观的处世态度看待周围环境，发现自己在新加坡工作和生活的日子里，交了很多受英文教育而品格高尚、有爱心的新加坡朋友。日子愈久，对新加坡的感情愈深。他们相信自己也会在工作中，以人格和实力赢得同事们的尊重。^[19]

显然，无论新加坡华人，还是中国新移民，双方都在调整自我和对方的关系与看法。许多人注意到，新加坡华人对中国新移民的态度，正由最初心存傲慢与偏见，逐渐转向接受与欣赏。这种良性互动，为中国新移民适应和融入居住国创造了有益环境。

纵观而言，中国新移民与新加坡华人经历了起初的接近和接触阶段后，开始了相互了解和理解时期，进而实现了关系调整发展的新阶段。在此过程中，新加坡的社会结构，无论是人口数量、语言现象、文化习俗，还是经济成长、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都由于中国新移民而发生了一些根本性变化。当越来越多的中国新移民来到新加坡，并努力成为新加坡华人的时候，新的社会融合及地区整合将因此而不断向前推进。

四、海外民间关系发展的时代价值

本文所谓“民间关系”，指的是海外移民群体在与各居住国人民共处、互动中所形成的文化多元、价值共享历程。它涉及移居国社会结构、社会变迁与民族和谐诸内容，也关涉移出国社会转型、社会发展和反哺期待等话题。事实上，在民族国家和跨国主义互为激荡的年代，海外民间关系发展的一个直接后果，无疑与国家关系相关，与地区关系相合。中国和新加坡两国特殊的历史发展、政治地位和文化联系，决定了中、新在连接东亚和东南亚关系进程中的独特作用。因此，扩大政治互信，加强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利益，既是国家关系，也是民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移民之于民间关系和国家关系的作为，构成海外民间关系发展的一个基本内容。

（一）中国政府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与新华侨华人的作为

2005年9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倡议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此举被视为是2005年中国外交理念的一大建树。“和谐”理念源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它追求以“仁”为核心，以“德”为基础，以“礼”为规范，以“和谐”为目标的境界。^[20] 运用到对外政策和关系上，则强调各国政府之间和人民之间的互信、互利、平等与协作，强调以经济发展为先，去除政治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和民间关系的共同发展中寻求双赢，以促成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使21世纪成为“人人享有发展的世纪”。^[21] 返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关系史，不难发现，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种和平、和谐的外交理念便在新中国对外侨务政策中得以实践和体现。以周恩来总理为代表的新中国政府第一代领导人所具有的深厚的儒家情怀，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开展，以及东南亚各国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和平、和谐的“外交—侨务”方针。^[22] 二战后至今60多年来，中国政府对于海外侨民的期待，始终以“促和谐、谋发展”为根本，敦促华侨华人致力于居住国民间关系和国家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有学者曾把海外华侨史，概括为“一部拓荒史、逃难史、苦力史和革命史”，^[23] 但换一种角度看，它又何尝不是一部与各居住国人民积极交往的民间关系融治史呢？正是海外华侨华人，以群体的仁爱之心、宽恕之道、克己奉献的精

许多媒体在谈及新加坡的中国大陆新移民时，均选用了如此具有转折性内容的标题。此外，作者通过和新加坡各行各业人士的接触，也感受到新加坡华人对于中国大陆新移民的客观评价和肯定。

神，才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内在价值的民间意义，及其与不同文化进行对话、交流和共享的可能模式、途径和前景。进而言之，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通过政府层面倡导，落实到“外交—侨务”政策中，从而形成海外华侨社会从个人到群体的身体力行。纵观世界各国移民史，除了新中国政府外，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政府如此主动地要求其海外侨民，积极融入居住国，与当地人民打成一片，为居住国建设服务——那样一种“与众不同”的国家政策。也因此，新中国政府“睦邻周边”的外交方针，离不开华侨华人的群体实践和民间支持。如今，海内外虽然有多种呼声，要求中国政府恢复“双重国籍”，以便于海外华人与中国往来。但中国政府清醒地意识到，华人问题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中至今存在的一个历史话题。对此，坚定地贯彻不实行“双重国籍”原则和既定的华人工作方针，就成为新时期中国政府“睦邻、安邻、富邻”新亚洲政策在周边国家华人问题上的具体实践和真正落实。此其一。

其二，近年随着中国国家地位的提升，民族文化如何走出去，以文化促和谐、谋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也是文化战略。为此，中国《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强调要拓展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渠道，发挥多元载体的文化传播作用，努力构建国际文化营销网络；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努力缩小对外文化贸易方面的逆差，扩大中国文化的覆盖面和国际影响力。^[24]在此过程中，华侨华人无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要载体之一。近代以来，他们凭借自身的文化身份和实践，给世界各国人民带去了具有浓郁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从饮食文化、文学艺术到哲学观念，越来越多的海外人士对于中华文化不再惊异与陌生。世界各国的新、老唐人街，固然是个延续至今、生生不灭、日新月异的窗口，而现身于世界各国科技、教育和文化领域的各路华人精英，他们在深受西方文化熏陶之余，仍念念不忘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他们对于中华文化的推介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和现实功用。当人们在波士顿、巴黎乃至世界各地看到建筑大师贝聿铭作品的时候，也会重返苏州观赏他那简约古朴的山水园林之思。中西艺术结合的形象传神，为不同文化互补、沟通乃至融合提供了现实见证。而中国政府对于华侨华人的期待，除了与各居住国人民友好相处、共同发展之外，还有一个担当起文化传承和传播的使命和责任——让中华文明的力量跨越国界，协和万邦，成为全球文明发展史中有益的组成部分。

（二）居住国政府搭乘中国经济快车，有赖于新华侨华人纽带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令新加坡华人新移民的角色作用愈益醒目，特别是在两国经贸发展和文化交流过程中，有双边社会文化背景的新移民具有格外优势。2001年，时任新加坡贸工部部长的杨荣文表示，在贸发局事先没有刻意安排的情况下，他率领访问中国西部的57人考察团中，有4位是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杨荣文说：“他们已经是新加坡人，孩子在新加坡长大，他们和我们一起工作，认同新加坡。不过，当他们回到自己的省份时，还是流露出自在的感觉。当我把他们介绍给当地官员时，他们就像回到家一样。”“这意味着，中国人才移民到新加坡，已经为我们制造了一个很有价值的经济联络网，我们应该善用它。”^[25]新移民社会网络的构造，正在为散居各地的新移民连接居住国和祖籍国提供切实可行的社会活动空间，它为跨国经济互动和新文化的建构提供了共享平台。对此，许多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和各级官员都充满期待，并且承认外

20世纪80年代后，越南政府对海外越侨也推行类似的融入政策。

社会网络分析法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被认为是一种描述和研究社会关系结构的观点和方法。有关的分析，在社会科学界已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指标体系和概念方法。本文的旨趣不在于具体指标的测量与运用，而是以此为视角说明，通过网络，相关或共同利益的人们，彼此连接，共享信息，互为认同，实现互助。进而言之，通过网络功效，人们在正确的时间、地点找到正确的人和正确的信息，从而获得更多有利于个人和群体发展的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因此被解释为由人与信息的互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组成的结构。参见“Social Networks: Connecting People with information and each other.” <http://www.verity.com>, July 2002.

来人才不仅是本国重要的社会资本和有作用的社会网络的一部分，更是国家间经贸关系互动的重要实践者和促进者之一。这些新移民或跨国华人与传统移民不同，其互动领域的一个主要特征表现为“非地域性”，即领土与地域——建构于自身活动的空间之中，民族国家的地域、政治意义在新移民那里不再重要。相反，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空间具有更多意蕴。^[26]这种移民的跨国互动显示，当移民不断寻求融入居住国的时候，他们不再像以往那样“落地生根”，而是随时在多个跨国舞台上游走，运用在不同环境中的社会资本为居住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谋求更多可能性。因而，作为移民中的模范，他们是居住国政府值得予以厚望的跨国华人。

（三）跨国华人与民间关系、国家关系和区域共同体互为关涉

海外移民与居住国人民的关系互动，有助于两国间官方关系的发展，虽然这种发展的力度不会在短时期内表现得明显而突出，但假以时日，它能奠定国家关系发展的基础，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的深度。故此，新移民的跨国活动正在成为促进国家关系发展的新的实践领域和努力方向。当然，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移民的跨国活动并非新现象，只是到了今天，基于共同关涉和共同利益构建起来的网络和结构完整的社群组织，才使得它日益具有制度化意义。^[27]正是这类跨国社群组织在调用社会资本，建构居住国和祖籍国双方的社会空间时，不断运用和扩大联系彼此的社会网络，从而在地区关系格局中把国家联系了起来。跨国华人及其组织，由于其与居住国和祖籍国在政治诉求、经济需求、文化追求方面，有着共同关涉和共同利益，故能在相关领域内发展出多重关怀和跨国互动。许多成功的新移民，在自觉融入居住国的同时，更积极投资中国，创办实业，扩大事业，从而通过个人的行为——关系把区域内的国家连接了起来。

移民的社会网络，作为一种移民个人和群体的社会资本，不仅表现在移民产生的原因以及延续的机制等方面，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人际结构，网络介于个人决策的微观层面与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之间，通过网络，可以了解全球化时代移民的社会特征及其存在结构。^[28]如今，新加坡中国新移民在不同领域，为当地社会做出了贡献。他们中的许多人，经常返回中国探亲、经商和工作，不断建构和扩大有益于两国民间往来的关系网络，成为新、中之间跨国社会空间的主要行为者。2006年针对领取新加坡政府奖学金的中国留学生的一项调查显示，51%的受访者表示计划在3-5年内继续留在新加坡工作，30%准备回到中国，另有19%有意到其他国家发展。无疑，这些在新加坡学有所成的年轻人，无论留去，都会在中、新民间关系发展中发挥特殊作用。他们是一批对于新加坡充满特殊感情的人。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批人在把新加坡的价值观念和生活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属于一种“可以通过个人直接或间接关系而获致的资源”，它与社会网络的概念密不可分(参见罗家德、赵延东：《社会资本的层次及其测量方法》，李培林主编《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102页)。当社会资本概念运用于移民研究领域时，移民的“社会资本”，指“移民个人通过其社会网络和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身份而获得的调动稀缺资源的能力”。其伸展范围从非正式团体到高度组织化的机构，包括家庭、邻里、组织、志愿团体、运动者俱乐部、自助团体、家长—教师联合会、信仰团体和竞选集团，以及通过技术而构成的“虚拟”环境。所有这些关系领域都构成社会资本的基本要素，其基础在于成员间相互信任。换言之，社会资本是建立在共同信仰、规范和价值基础之上的(参见王奋宇、赵延东：《理论与研究综述》，中国网2003年6月20日)。

该项调查对象是首六批奖学金得主(新加坡政府自1992年起颁发奖学金给中国学生，让他们到本地大学就读)，迄今这些留学生共有1195人。他们已经修完本科课程，正在履行须在本地工作六年的合约，其中105人接受了问卷调查。在105名受访者中，74%的人已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1人为新加坡公民。受访的大多数留学生主修理工科，毕业后在信息科技行业、教育及研究机构工作的居多，其年薪多数介于2.5万元到4.5万元之间。“新加坡过半中国留学生愿留下”，[新加坡]《联合早报》2006年2月11日。

2006年12月，笔者在和在新加坡一些中国留学生的交谈中发现，他们对于新加坡已经充满感情。一个显著例子是，在他们离开新加坡去往英国或其他国家的时间里，他们会想念新加坡的一草一木，盼望尽早回到新加坡。这种内心流露，或许便是一种“新加坡认同”。

方式带回中国的时候，也把中国经济、文化最新发展与进步的讯息传回新加坡。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关系和地区关系的民间推动力之一。

2005 年始，新加坡政府为招揽中国人才，将其全球揽才机构“联系新加坡”开进驻上海，同时抛出了高薪和居留权两大“橄榄枝”，以吸引熟练的专业工人和技师。此项政策的出台说明，中国新移民的杰出表现已经为两地持续互动拓宽了更广泛的途径。它亦显示，民间交流和社会互动的积极功用正在为推动国家政策的相应提供，取得制度层面的进展。而这种政策进展的效果，又将继续推动两国民间交往的深入发展，从而为经济互补、文化共享的地区模式提供跨国社会网络架构的制度保障。

有必要看到的是，在中国人不断“南下”新加坡的同时，也有一些新加坡华人选择“北上”到中国工作、求学、经商或定居。^[29]在 2000—2004 年底的 5 年间，到上海发展的新加坡人，已从 1000 人增加到 5000 人。^[30]这种双向流动进程，虽然刚刚起步，却预示着民间关系深入发展的端倪，而中国新移民则为这种跨国互动，提供了实践基础和努力方向。人们相信，若干年后，新加坡的中国大陆新移民，无论言谈举止，还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会越来越新加坡化。当亚洲区域内各国人民互为认同、加强凝聚的时候，一种亚洲共同体意识或者区域共同体意识，会随着经济整合和相互依赖的加深而逐渐形成。换言之，亚洲意识，除了官方倡导之外，它的基础在民间，在于区域内各国人民所拥有的一种有关东亚（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历史、现实和未来走向的集体认知和社会认同。

值此中国—东盟政治互信、经济与社会合作日趋发展的今天，国家关系框架之下的民间交流和往来将不断频繁与活跃。可以想见，这种地区内的人员、资金和物质的高度流动，会从不同层面推进国家之间、人民之间的多层次交流与合作，从而为未来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奠定广泛的社会民意基础。

五、民间关系的模式特征和意义分析

海外民间关系的模式特征属于民族国家框架下的派生物，它与官方关系（一国内部的官与民之间）和国家关系（国与国之间）相对应而成立，并在此基础上，构成其对于国家关系和国际关系的不同意义。

（一）民间关系与官方关系的区别与联系

民间关系通常指两国人民由于接近、接触和交往而形成的相互之间亲切或憎恨的感情，具有自发性和非制度性特征；官方关系则通常是由两国政府通过协商和谈判，签署一系列文件，以制度形式加以确认和安排的结果。一般而言，两国间民间关系有三种情况：1. 先于政府间关系形成而率先发展，其积极形式为“以民促官”，属民间关系的主动作为；2. 在政府间关系达成的前提下，开展两国民间交流和活动。如，中国、新加坡民间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即属此列；3. 政府间关系虽然达成，但民间关系缺少相应的发展，它可能由于文化隔膜和地理偏远等因素所致。

在上述三种形式的民间关系中，中、新民间关系的发展属于第二种。也就是说，1949—1990 年间，两国民间互动往来较少，人民之间隔膜。1990 年两国建交后，民间往来才得以形成、发展和巩固。在建交迄今的 16 年里，两国政府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民间关系的改善和提升。就新加坡政府而言，领导人始终强调，国家的强大和发展，需要借助外来人才和智力，劝导本国人民要

新加坡放宽投资移民转入资金投资条件，资金到位后三个月全家及主申请人父母可获得新加坡永久居民权，无学历、语言及居住要求。“新加坡华人在国家情感与全球化趋势下获取平衡”，北京《瞭望东方周刊》2005 年 5 月 11 日。

以开放胸襟对待来自其他国家的新移民，包括马来人、印度人和中国人。至于中国政府，历届领导人都强调，要加强和重视国家关系框架下的民间关系和民间交流，把睦邻外交工作贯彻到民间关系的架构中，推动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关系发展。同时，中国政府特别注意到，当官方力量无能为力的时候，民间力量可以发挥作用；当官方渠道不畅的时候，民间渠道始终存在；当官方制度未达成之时，民间组织可以巧于安排。所有这些民间关系的运用，在中、印（尼）恢复邦交和中、韩建交的过程中，都有过不同的功能运用。可以说，民间关系有拾遗补缺之用。而华人移民个人和群体的角色功用，为国家关系的民间推动做出了自己的诠释。

（二）民间关系和民间外交的区别和联系

民间关系，可理解为由民众日常交往而形成的互为认同或互为排斥的一种心理或行为，其进程历时缓慢，没有目的性和方案性，其积极后果是导向人民之间持久的和平和国家关系的友好深入，其消极后果则是导向人民之间排斥的加剧和国家关系的持续隔阂。民间关系的两种不同发展结果，自然会影响到波及到国家关系。至于民间外交，则是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一部分，具体通过民间组织和民间行为表达官方意图。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即为成立较早的民间外交团体，紧密配合中国国家的外交方针，致力于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与发展，推动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与进步。^[31]这种民间外交，是作为政府外交的补充机制，其目的是通过各种民间渠道，推进国家关系发展，进而达成政治互信的奠定和确立，具有半官方色彩。

由此，不妨把民间关系看作是一个人民之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进而影响国家行为的过程；是一个透过交往活动的持续，实现双边关系全面化，从而加深国家之间、人民之间相互依赖的过程。它比民间外交更有广泛性和覆盖面，更能体现移民群体各个阶层的行为、关系的综合性。在这个“民间活动作用越来越大，政府作用越来越小的时代”，^[32]民间外交和民间关系的方法和途径将会不断得到运用和拓展，特别是与民间外交具有不同涵义的民间关系，将会在国家关系和国际关系两个层面体现出时代意义。

首先，民间关系之于国家关系的意义。当民族主义和跨国主义此消彼长之际，跨国力量、民间力量正在构成国家关系发展中的重要一环。2006年12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纪念东盟—中国对话伙伴关系15周年研讨会上，与会者肯定，东盟—中国关系已进入成熟、全面、务实的新阶段，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济融合日趋加深，贸易额逐年攀升，相互投资不断增加，在重点领域的合作全面展开。过去15年来，随着社会文化及人员交往的广度与深度的加强，令东盟和中国在相互的社会经济发展与维持地区和平中发挥着相互支持和互补的作用。此中，国家间的制度安排，着重于经济发展与相互依赖的加强，致力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努力固然居第一位，但紧接而来的是民间关系的日趋加强和巩固，新华侨华人在政府作用推动下，通过日益频繁的市场与社会网络以及人员流动，为国家间的经贸关系形成跨区域的连结。如今，中、新两国已互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新加坡是中国国别贸易统计中的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新加坡第五大出口国和第三大进口国。新加坡也是对中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从国别统计中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看，新加坡为中国第四大投资来源国。^[33]中国和新加坡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也带动了区域经济

在2006年的国庆演说中，李显龙总理特别强调，社会要保持活力，不但要有健康的人民，也要有足够的人口。为了确保新加坡繁荣昌盛，必须鼓励生育和吸引新移民。他呼吁，新加坡人不要抗拒外来移民，不要担心新移民抢走他们的工作。要以宽广的胸怀看待新移民，鼓励他们在此安家立业，帮助他们融入社会。“总理：新加坡必须增加人口吸引新移民”，[新加坡]《联合早报》2006年8月20日。

民间外交又称人民外交、国民外交，可具体划分为民间对民间、民间对官方、官方对民间三种基本形式。王玉贵、顾莹惠、朱蓉蓉：《中国共产党民间外交理论与实践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3期，第20页。

的整体繁荣。

中、新建交以来，透过中国新移民和新加坡华人的社会互动，可以发现民间关系在由弱向强的转化过程中，双方的适应、调整和反应，已进入新阶段。中、新民间关系的意义已不仅仅是过去一个多世纪历史血脉的简单延续，而是推进地区关系发展，改善和改变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发展的示范。新加坡自 1965 年以来，已走过了李光耀时代（1965 - 1990 年）、吴作栋时代（1991 - 2005 年），进入李显龙时代（2005 年 8 月就任总理）。在短暂的建国过程中，新加坡华人形成了自身的民族国家意识，不再认同于中国。对此，无论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还是两岸三地的中国人，都有清醒认识，并发展出了和新加坡华人共存互动的模式：在国家关系前提下构筑民间关系，在民间关系基础上推进国家关系。尽管目前两国关系仍受制于现实的、地理的、政策的和心理的疏离和隔膜，但无疑，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人们有理由期待中、新民间关系会在既有基础上持续深入，从而为两国的国家利益提供可以获取的民间资源。与此同时，中、新关系的全面发展还有赖于“自上而下”国家关系和“自下而上”民间关系的共同推动、互补与共存。在此进程中，国家关系是主导，民间关系是基础。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群体，作为推动两国民间关系发展的重要载体和社会力量，将为全球化时代的移民个人与国家关系和地区关系的发展做出积极选择。

其次，民间关系之于国际关系的意义。“二战以来，随着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发展及其政治作用的日益增强，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更多是在不同国家的人民之间直接发生的。这就要求国际政治体系必须将反映人民的意志和需要放在首位，以促进国际层面人与人、民族与民族、种族与种族、宗教与宗教之间的交往，促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从而建立一种新的国际政治体制，为这种‘人民中心’政治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国际政治空间。”^[34]这样，“全球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与政治空间，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成为人类自身的思想反思和社会运动交相推动的结果，其中既有对人类各种危机、全球化弊端和人类历史的反思，又有世界范围内人们超越国家的直接行动；既有人类不同文明的历史文化冲突和阻碍，又有全球化发展趋势强大力量的推进。总之，它在国家空前弱化的世界新形势下获得政治空间并自我组织起来。”^[35]目前，在中国和东南亚之间，伴随着跨国人员所带来的物质流和文化流的加强，人类普遍价值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于共同利益的关涉，一种区域性的市民社会有可能率先在跨国移民群体中形成，它将为移民和国家利益的获得和互动寻求各种现实的途径。换言之，区域市民社会的兴起，将有力地推动地区内各国的整合和群体认同，促进跨国范围的交往与合作、沟通和交流，在区域人民中间形成一种共同体意识和共同身份认同，而这将有利于消除民族、国家间的隔阂和分歧，有利于在区域问题的解决方面达成共识，从而避免所谓“文明的冲突”而走向区域或全球的理解与对话，而这同时也为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运作培养了宽容、信任、责任及合作等最基本的社会基础。^[36]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 30 年，恰是中国海外新移民形成和发展的阶段，对于这一群体“行为—关系—制度”特征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移民群体之于国家结构、地区变迁的意义，更有助于了解民族国家和跨国移民在全球化时代的利益选择和关系趋向。当全球各类宗亲会、华商网

“弱”的含义包括两方面：一指双方关系刚刚起步，没有深厚的情谊基础；二指双方关系起步初期，彼此的负面评价远大于正面评价。

“强”的含义也有两方面：一指双方关系经过接触和了解的阶段，彼此间已具有适当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评价；二指随着双方关系互动和适应的加强与深入，必将推动经济、社会和文化交往的普遍化，民间关系推进国家关系发展的局面也就到来。

至 2005 年，中国新移民人数估计有 600 万人，其中八成来自中国大陆（约 450 万人），其他是源自台湾和香港的留学或商务移民。“中国新移民大量涌入使东南亚国家更多人学华文”，[新加坡]《联合早报》2006 年 10 月 2 日。

络、华人专业技术协会通过社会组织、经济活动和科技交流，凝聚起华侨华人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时，当全球各地的“和平统一促进会”在运用民间力量加强中国统一的海外基础时，移民之于国家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意义就此凸显：从个人、群体到各类社团，组织化的网络机制正在把移民—国家—地区连接起来，民间关系的模式特征和意义架构由此确立，并将在全球化的舞台上，展示其与国家关系、地区关系的进程和互动。

六、结 语

本研究以新加坡的中国大陆新移民为载体，考察地区格局中跨国移民在推进国家关系和地区关系中的意义和作为以及国家关系和国家利益在新时代的追求和方向，是为理论上的尝试。研究显示，国家关系的建立，为民间关系打开了交流和交往的正式而广泛的渠道；尽管国家关系的建立和互动不依赖于民间关系，但民间关系可以在不同层面推进国家关系；民间关系的顺利发展，有赖于国家实力结构的相对平衡和相互依赖的内在需要；至于民间关系的友好深入，则取决于跨国移民的经济成就、文化努力和社会贡献。只有当跨国移民群体在沟通居住国和祖籍国之间积极有为的时候，才能够为国家关系的持久深入发展奠定厚实的民间基础。当然，目前除了为数不多的跨国移民个人具有突出成就之外，庞大的跨国移民群体还远没有达到足以在各个领域形成广泛影响的程度。因此，透过民间关系互动把握跨国移民之于民族国家的社会功用（包括居住国和祖籍国双方社会转型和结构变迁的内在意义），仍然是一个有待继续深入探讨的话题。

[注释]

- [1] [6] [8] [12] [13] [16] [日] 小木裕文：《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厦门大学《南洋资料译丛》，2003年第1期，第22-28页。
- [2] 详见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 [3] [26] 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第212-242、223页。
- [4] See Linda G. Basch, Nina Glick Schillier, and Christina Blanc Szanton, *Nation Unbou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and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State*, Langhorne, PA: Gordon and Breach, 1994, p. 9; Alejandro Portes, Luis E. Guarnizo and Patricia Landolt, *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ism: Pitfalls and Promise of an Emergent Research Field*,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2, No. 2, 1999, pp. 217-37.
- [5] 里瓦·卡斯托里亚诺著、刘北成译：《移居、跨国社群和公民身份》，北京《国际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 [7] 《新加坡：未必很理想》，上海热线，2001年2月28日。
- [9] [10]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6月27日。
- [11] 《曾玲博士“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现状与研究思考”专题讲座纪要》，北京《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79-80页。
- [14] 吴庆棠：《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2月第1版，第264页。
- [15] “中国新移民能对知识经济做出贡献”，[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7月30日。
- [17] 《新加坡人看中国新移民》，广东侨网，2004年6月14日。
- [18] 杨建伟：“新移民的作用与价值——读李光耀国大‘资政论坛’讲演有感”，[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

2002年春节前夕，新加坡发生了诈骗中国工人的巨额汇款案，引起中、新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案犯蓝成锋涉嫌诈骗中国工人800多万新元汇款。新加坡警方以刑事罪名将其控上法庭。事发后，新加坡华人社团积极筹措捐款，试图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解囊相助（中新网，北京2002年2月21日）。它表明，民间互动的不良状况反映和牵涉到国家关系层面时，相应状况会得到抑制、改善和规范。此外，它不但没有损害两国关系，反而加强了彼此互动（许多新加坡人积极捐款，希望能够为中国劳工减去生活负担，增添心中暖意），并促动两国政府在更广泛层面上进行制度合作，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10月24日。

- [19] 汪振帆：“中国人对新加坡华人的看法”，[新加坡]《联合早报》，具体日期不祥。
- [20] 《弘扬东方文化，构建和谐世界——王毅大使在立命馆大学孔子学院的演讲》，http://www.chinaembassy.or.jp, 2005年11月17日。
- [21] 中国新闻网，2005年12月23日。
- [22] 详见吴前进：《国家关系中的华侨华人和华族》，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7月。
- [23] 何茂春：“对话：海外华人在政治上会偏袒中国吗？”，北京《环球时报》2006年6月30日。
- [24] http://culture.people.com.cn/CB/22219/4819250.html, 人民网，2006年9月15日。
- [25] “中国新移民为新加坡架起络网”，[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8月30日。
- [27] 里瓦·卡斯托里亚诺：《移居、跨国社群和公民身份》，北京《国际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 [28] [西班牙]华金·阿朗戈：《移民研究的评析》，引自北京《新华文摘》2001年第12期，第156-157页。
- [29] 张从兴：“新、中语言南来北上”，[新加坡]《联合早报》，2005年10月1日。
- [30] 新加坡国立大学网 http://www.nus.edu.sg, 2006年2月5日。
- [31] “发展民间外交 推动国际合作——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人民日报》2005年1月20日。
-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金熙德研究员的观点。详见戴建芳：《民间外交主导的世纪：东亚区域合作的问题与展望——“东亚区域合作与民间外交的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上海《学术月刊》2004年第6期，第117页。
- [33] 《中国与新加坡经贸合作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时报，http://www.sina.net, 2006年4月6日。
- [34] [35] [36] 蔡拓、刘贞：《全球市民社会与当代》，邓正来、[美]杰弗里·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增订版），2006年1月第1版，第594、588-589、595页。

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第六届国际会议 内地学者注册表

姓 名	(中文) (拼音)	性 别	
工作单位	(中文) (英文)	职 位	
通讯地址 (邮编)			
电 话		传 真	
Email			
论文题目			
宾馆预定 (请选择)	<input type="checkbox"/> 北京友谊宾馆2号楼（四星级） 标准间：620/天（含早餐、服务费） 预订时间：___月___日至___月___日（___晚） <input type="checkbox"/> 北京邮电疗养院 标准间：300/天（含早餐、服务费） 预订时间：___月___日至___月___日（___晚） 为避免给您造成损失，如需合住，请合住人不要重复填写此项信息。 <input type="checkbox"/> 自行解决住宿		

若您有意参会，请填写本表并回馈给会议秘书处。

会议秘书处

联系人：杜媛媛

电话：010-62759322

传真：010-62759322/1259

Email: oec238c@pku.edu.cn

网址: http://oec.pku.edu.cn/issco